

吴崑佚文《东陲游记》考评

曲 晓 璠

吴崑，字寿田，寿天，别号吼生，湖北黄冈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同盟会本部评议员兼民报干事、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在协助黄兴和宋教仁创办《民报》、发动和组织长江流域及东三省反清革命过程中做出过突出贡献，因此在同盟会内有“鄂籍会员四杰之一”的称誉。吴崑一生遗文甚少，迄今为止，在所有辛亥革命史料中尚未见到任何一篇属于他的亲笔著述。笔者近日在收集近代东北史料时，在民初进步刊物《民权素》中发现了吴崑的一篇佚文——《东陲游记》。通观其内容，知《东陲游记》实际是作者在东北组织反清起义的日记，其所记史实多为一般文献所未载，因此，《游记》无论对于我们研究吴崑个人的生平事迹还是同盟会的历史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为求教于方家并期待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本文拟将其考索经过及佚文的文献价值做一完整介绍。

一

《东陲游记》全文约1.5万字，分别载于《民权素》第六、七、九、十三、十六集中。^①如同我们见到的近代史上的许多个人日记一样，作者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出于保护发表刊物及自身安全的需要，在著者栏里不仅未署其真实姓名，也未标出自己的常用字号，而写了“天寿”二字。查《室名别号索引》、《古

今人物别名索引》、《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等权威性的笔名、别号工具书，“天寿”二字均不见著录或考述。尽管如此，我们从日记所载史实进行分析，亦可断定其作者非吴崑莫属。

如《游记》载：“余于俄日战局告终之十有七月，偕友人某君将游满洲，以观察战后之状况，并俄日两国在满洲之行动。束装既竟，友人病，不果行。余遂率同辽阳人韩某，从（日本）东京出发，八月既望，至神户。大阪商船会社之‘铁岭丸’，越两日始出帆，乃返大阪。……海行三日，至大连”。②

这段史料虽然未从正面反映作者的具体身份及姓名，但至少为我们解决了与考察作者线索有连带关系的两个重要问题：（1）作者东陲旅行的历史年代，即《游记》的写定时间。我们知道，日俄战争的告终是以1905年9月日俄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为标志的，而《游记》作者最初“将游满洲”的时间是此后的“十有七月”，逐月相加，即为1907年2月。弄清了这一年份，我们就知道了作者由日本东京正式出发到神户的时间“八月既望”是1907年的农历八月十六。（2）明确了作者旅行活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是日本东京至中国东北大连。由于当时旅居东京、并往返于东京一大连航线上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留日学生和流亡的革命党人，因此，我们就有理由设想《游记》作者极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位。而接下来的一段原作者回忆其东北之行真实意图的记述就完全证实了笔者的这一判断。

作者称：“余之来满洲也，固别有目的游历之说，特饰词耳。余于八月初旬，得在满洲秘密党人之报告，谓事机成熟，急待进行，乃以商之东京本部诸人，咸相赞助，余遂重受本部之委任，荷负完全责任而为此行。行时携有本部颁发之辽东军政府关防一颗，委任状若干，《革命方略》数册，经营辽东一特别团体所制定之井字旗数十张，此时悉秘密运至奉天，与驻奉党人会

合。而急欲探明其运动之实力，以定举事方针”。^③

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作者是中国同盟会的一位重要成员，他来东北是代表同盟会东京本部全权负责发动和领导反清起义的。追循这一线索，笔者详细查阅了同盟会及其相关文献，获知1907年在东北从事反清活动的同盟会重要人物有徐静心、宋教仁、白逾桓、末永节（日本）、吴崑、柏文蔚、吴禄贞、商震等8人，但其中徐、柏、商及吴禄贞4人是1906年由山东和湖北来东北的，只有宋、白、末永节、吴崑4人是1907年由东京来此的。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核实，证明宋教仁、白逾桓、末永节三人又可排除在外。其主要证据是：

第一，宋、白、末永三人来东北的时间和旅行路线与《游记》作者旅行时间、地点完全不同。《宋教仁日记》曾记载：宋、白是1907年3月下旬来东北的。具体过程是：3月23日宋与日本人古川清由东京出发，25日到门司与先期来此的白逾桓会合，乘日船“咸兴丸”经朝鲜仁川于4月1日在安东上岸。^④而《游记》作者是同年8月由大连上岸的，并且在此之前至少半年内没有来过东北。对于末永节1907年来东北的确切时间目前虽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也是在《游记》作者此次来东北之前就已到了大连、并且一直在辽东半岛活动。因为《游记》中记载了作者在抵达大连时，在码头上迎接的就是末永节本人。

第二，作者已用非第一人称、即“余友宋君”、“吾友白君”的形式在《游记》中记述了宋教仁、白逾桓的名字。如《游记》农历1907年十月五日记：“余友人宋君，著《间岛问题》”^⑤一书。考《间岛问题》，近代只有宋教仁所著一部，显然，这里所说的就是宋教仁。所以，我们认为，《游记》作者不会是宋、白、末永三人。

以上我们所罗列的1907年在东北活动的8位同盟会重要人物只剩下吴崑一人了，虽已接近证明作者就是他了，但为防止疏

误，我们还要通过其它史料进一步对照印证。在宋教仁所著《程家桎革命大事略》中曾载：“八月，……吴崑走奉天。时吴禄贞防边延吉，君（程家桎）告禄贞任侠，吾党满洲大事，宜与相谋。吴崑走鄂多里，俟得端绪，当为策应”^⑥另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载：（1907年）冬十月，吴崑来延吉。吴为宋教仁、白逾桓同侣也。余告吴崑，应注意避开，此间工作由余负责联络，筹资三百元，吴绶卿（吴禄贞号）亦赠五百元，交吴崑由海参崴转赴日本”^⑦上述两件史料的记述不仅与《游记》作者来东北的时间是一致的，也与《游记》所记其旅行路线、活动内容完全吻合，如《游记》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初二日条载：至哈尔滨，又二十里，宿凤头山。自张广材岭经鄂多里之野”，^⑧“至延吉厅，往南营边务行衙，晤吴君绶卿。又往中营晤柏君烈武（文蔚）”。柏“且以吉钱百吊助余之行”。^⑨因此可见，《东陲游记》的作者确是吴崑。

二

《东陲游记》就其文献价值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它近乎完整地向我们提供了吴崑本人1907年东北之行全部活动的历史记录、使我们彻底搞清了这一长期以来始终模糊不清的重要史实。吴崑1907年的东北之行，是同盟会在东北地区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活动，在东北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这次活动，最早见诸于湖北革命党人李翊东所著《吴崑传》。内称：“丁未春，（吴崑）与宋教仁、白逾桓密赴关外，集合李逢春、金寿山诸马侠，设同盟会支部于辽东”。^⑩这一记述虽然简略，并且又不准确，但由于没有更直接的第一手材料，因此这一史料以后为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宁武《东北辛亥革命史要》等一些较有影响的论著所引用、沿袭，

致使学术界对吴崑东北之行始终存在错误概念：即吴崑是同宋教仁一同来东北的，其活动目的是联络“马侠”。但从《宋教仁日记》中又看不出任何有关吴崑来东北的蛛丝马迹，所以研究东北辛亥革命史者对此亦感到十分困惑。而《东陲游记》的发现，不仅使我们真正弄清了吴崑东北之行的时间（农历1907年8月中旬至11月下旬）、旅行路线（由日本东京出发，经神户乘船，在大连上岸，随后去奉天、吉林、敦化、延吉，最后由海参崴返日），还搞清了这次活动的基本目的和任务，即在宋、白联络马侠的基础上，组织反清起义。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宋教仁、白逾桓那次活动与吴崑东北之行两者之间关系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次，它为我们深入研究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创建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线索。

同盟会辽东支部是同盟会在东北建立的唯一的直属分支机构，是东北三省反清革命的领导核心。但关于它的创建地点、主要领导人以及其内部组织结构等问题，由于史料记载不一，学术界存在分歧。如就其创建地点来说，以往就有冯自由的大连说、宁武的奉天说，还有安东说等等。我们从《游记》中所反映出的吴崑始终以奉天省城为联络中心，并在此召开了汇聚各路代表参加的起义会议这一情况看，支部总机关设在奉天省城的可能性亦是最大的。关于辽东支部的领导人，一般认为有徐静心，吴禄贞，左雨农、张榕、末永节等人，但本篇史料较多地谈到了隐藏于奉天的浙江人胡子静和潜伏于吉林的徐子俊的情况。从这两个人一直具体负责吴崑与他人的“居间联络”看，胡、徐二人也是辽东支部的核心人物，这是我们以往所不晓得的。关于辽东支部的组织结构以往毫无记载，但按同盟会的通例，支部所有党员应以“军队编制”，由军政府负责领导。那么辽东支部内是否也建立了一个与支部平行的辽东军政府呢？依据《游记》所记吴崑接受东京本部颁发辽东军政府关防这一情节分析，辽东军政府是肯

定存在的。

第三，纠正并补充了以往史料和论著中关于白逾桓在东北被捕情况的错误记载。前已述及，在吴崑来东北之前、1907年3月，宋教仁、白逾桓、古川清曾来东北联络马侠。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因古川清叛变，白逾桓被清廷逮捕。有关白被捕一事，以往学术界是这样记述的：宋、白、吴三人的活动，被奉天巡警厅王治馨侦悉其事，吴、白同时被捕”。^⑪“他们在押解途中，经广宁县属沟帮子，在一妓女的帮助下，破械逃脱”。^⑫现对照《东陲游记》，可知上述记载是大有出入的。如《游记》十月十日记：友人白君（逾桓），寄居朝鲜新义州，闻余之来也，特趋至奉天”。“白君尚衣一夹和服，瑟缩之状，不言可知。余乃飞函于京友程君（家桧）处告急。不数日，得复书，并介绍信。一致吴绶卿，一致王奇裁（治馨）。王为巡警局总办也。……余乃持函往晤王。王为山东人，性豪迈，无官气，虽服官清廷，实输忱民党。见余之来，似颇能领悟，故亦不穷究余之行踪，亦以二百元相赠。余得此，除尝还旅舍外，复以半数分给白君，乃携其余者以就途，而赴长春。……不料余去四五日，有某国人古川清者，将白君之行踪，密告之于警局，复密告于总督公署。时总督徐世昌得密告后，惊恐万状，即日戒严，并面谕王奇裁设法拿办。不数小时，而白遂被捕入奉天监狱。后闻其深得王君之维护，尚未至为狱卒所苦。越一年，始出狱”。^⑬这就证明了当时被捕的只有白逾桓一人，所谓的吴、白同时被捕、在沟帮子逃脱一节纯系子虚乌有。而奉天警署的王治馨非但不是捕抓白逾桓的元凶，恰恰是一个暗中保护、同情革命党的人物。

第四，史料记述了作者沿途所经过的东北各主要城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况，为我们考察清末民初东北城市的发展史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如作者1907年11月15日记：“珲春城，成长圆形，居民五百余户，营商业者十之一（有日本人二十余寄居，卖

淫妇占全体人数之七八），为中韩俄国境间最重要之镇市。商业之重要输出品为牛与豕之家畜及小麦、大豆。输入品为天津之布匹与南方之杂货、烟草，及海参崴转输之各种洋货。驻吉强军二百人，旗防五六十人。有副都署一，筹饷局一，斗税局一，巡警局一，天主堂一，耶稣堂一。城外则一望平原，土地肥沃，各屯居民约万余”。^⑭

此外，《游记》中还记述了一些如东北抗俄史、东北秘密会党史的材料，也都颇具参考价值。

注：

①在《民权素》第十六集所刊《东陲游记》的最末一行上标有“未完”字样。笔者从其记述的史实过程分析，尚缺少大约5—7天的日记。其原因是《民权素》在第十七集出版后遭到袁世凯政权的封禁，被迫停刊。《游记》余下部分未及刊出。

②③见《民权素》第六集：游记编，第六页，第九页，第十一页。

④参见《宋教仁集》下册，第722—725页，1981年中华书局刊行本。

⑤⑧⑨⑭见《民权素》第十六集·游记编，第一页，第三页。

⑥前揭《宋教仁集》下册，第439页。

⑦《近代史资料》总第40号，第11页。

⑩转自《革命人物志》第二集，第213页。

⑪⑫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第117页，115页 1981年中华书局刊行本。

⑬《民权素》第六集，游记编，第11页。

作者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